

十七年来經濟战线两条路线

斗争大事記

(工 交 口)

1949——1966

《红旗》编辑部六十周年纪念文集——斗争集中

示 誌 志 同 洵 林

首都彻底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

經濟路綫聯絡站

一九六七年八月

机关紅司：省 輕 工 紅 司 翻印
省計委紅司、《1118》

最高指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

林彪同志指示

“工交企业有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认识这个问题，工交企业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可言，就会采取应付的走过场的态度。我们要用文化大革命发展生产力，用文化大革命肃清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肃清刘、邓、彭的影响和薄的错误，他们是资产阶级路线。刘、邓不是五十天的影响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在他主持工作期间，从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自搞一套，对毛泽东思想有很大干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对工交部门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李富春同志讲话

(1967年4月18日)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同志们：关于生产问题，本来是总理要讲话的，因为总理还没有回来，要我来讲讲。我没有很好准备，想到几个问题，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

主席指示，军队不仅要支持左派，而且要支农、支工、支交通，搞军管，搞军事训练。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系列的措施，一系列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人民解放军，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抓革命、促生产的最大关怀，最大的支持，是在文化大革命决战时刻的一项很重要的决策，将会产生深远的意义。对于工农业生产，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将起着深远而重大的作用。特别是通过解放军到工厂、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把一套好作风，好传统带到工厂、农村中去，将使每一个工矿企业，每一个农村，每一个商店，更加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过去，在经济战线上，一般地说，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举得不高的，就是不突出政治，经过这次解放军去宣传，会使工矿企业、农村，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更高，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也就会搞的更快、更好。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必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把生产建设搞得更快、更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我十个月来的体会是：决不能搞“二元论”，不能把革命和生产平列，更不能拿生产来压革命。革命是统帅，一定要用革命来统帅生产，带动生产，推动生产。去年十二月以前，拿生产压革命，这是刘、邓和陶铸的作法。我们如果不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那我们就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不复辟，不能保证国家不变颜色。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的大事。因此，必须首先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必须以革命来带动生产，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挂帅，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来带动生产，推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然，生产发展了，也可以为革命提供物质基础，更加推进革命。正如林彪同志所讲的，从重要性来说，从主导性来说，革命应摆在首位，是第一位的问题；从时间的安排来说，生产的时间要占多些。中央去年十二月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就规定保证八小时工作制。我们完全相信，解放军一定会首先用政治来支左、支工、支农，首先用毛泽东思想来支左、支工、支农，一定能使革命和生产取得双胜利。

经济部门，特别是工交系统，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还有陈云、薄一波的影响是很深的。他们长期反对、抵制毛泽东思想，推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通过解放军对工农业的支援，我们要彻底地揭露和批判刘、邓、陈、薄在经济战线上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错误，肃清他们的流毒。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真正让毛泽东思想在经济战线的各个领域深深地扎根，统帅一切，把解放军突出政治，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一套好作风，好传统，带到经济战线上去。这是很重要、很伟大、很深刻的问题，也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在经济战线上需要斗批改的中心问题。

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关于刘、邓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已经讲的很清楚了。我想就经济战线上十几年来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简单地给同志们作一点介绍，提供一点线索。我自己还没有系统化，没有认真地研究，只是粗略地想了想，仅供同志们参考。

在经济战线上，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也就是说，解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另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加上陈云、薄一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回到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老路上去。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长期以来是很尖锐的进行的，是针锋相对的。

首先讲一讲毛主席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著作和指示是

很多的。还有一些會議中的談話，一些重要的指示，我們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出来。現在我所記得的，关键性的文章和講話有十九篇：

一、一九四〇年的《新民主主义論》。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还要搞第二步，即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提出了革命阶段論和不断革命論相結合，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必須銜接，不允許橫插一个資產階級專政的阶段。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經濟要以国营經濟为領導，同时把孙中山的“节制資本、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拿过来作新的解釋。要节制資本。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允許发展私人資本，也是有条件的，私人資本是不能操纵国計民生的，是要在国营經濟领导下，在国家計劃領導的。在农村平均地权，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互助合作經濟。

实际上，在經濟建設中，这种革命阶段論和不断革命論相結合的思想，一九三四年一月，主席在《我們的經濟政策》这篇文章里就讲过。这篇文章中讲：“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原則，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須的經濟方面的建設，集中經濟力量供給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經濟方面的联合，保證无产階級对农民的領導，争取国营經濟对私人經濟的領導，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可見，主席从一九三四年、一九四〇年就提出了經濟建設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与社会主义阶段相銜接，提出了个人經濟、私营經濟在国营經濟领导下，在不妨害国計民生的条件下，可以适当的发展。

二、一九四二年的《抗日时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提出了“发展經濟保證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总方針”。提出了人民战争，明确地指出了当时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上两条路綫的斗争。批判了当时單純的財政观点。“片面地看重了財政，不懂得整个經濟的重要性”，“只在單純的財政收支問題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決問題。”批判了不顾战争的需要，單純強調政府应施“仁政”的錯誤观点。这是謝覺哉的观点。还批判了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計劃的錯誤。（搞大軍工計劃、大盐业計劃）这是賀龙、高崗的思想。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就把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的关系辯証地提出来了，但是單純財政观点，陈云却一直保持到一九六二年。据我所知，他是得到刘少奇、邓小平支持的。

三、一九四五年的《論联合政府》。这是綱領性的文件。《論联合政府》进一步发展《新民主主义論》所闡述的思想，深刻地、馬列主义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内外的形势，論述了抗日战争中两条路綫、两条道路、两个戰場、两个地区的斗争，因而也就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前途。据此提出了我們党的綱領和政策。又重复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分田地、节制資本，私人資本的发展不能妨害国計民生的原則。提出将新中国建設成一个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独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并說明沒有这样一个国家，就不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业，沒有工业，就沒有巩固的国防，就沒有人民的福利，就沒有国家的富强。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工人階級的任务，不但为建設新中国而斗争，而且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近代化而斗争。这篇有綱領、有政策的文章，批駁了当时党外国民党的錯誤，批駁了党内的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

四、一九四五年的《必須学会做經濟工作》，这篇文章強調了自力更生，互助合作，組織起来，組織工农兵和机关都要搞生产，領導与广大群众相結合。

五、一九四八年的《在晋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給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篇講話实际上就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老实說，当时我是沒有体会。

六、一九四九年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告誡全党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提出了无产階級同资产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要警惕资产階級糖衣炮弹的攻击。同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轉向城市。全面地、深刻地論述了党的各項經濟政策，明确地提出了发展国营經濟、社会主义經濟，限制私营資本，引导个体經濟逐步向集体經濟发展。这是在全国解放前明确地提出来的經濟方針、經濟政策。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刘少奇大肆鼓吹发展資本主义，发展富农經濟。上次康生同志讲得很清楚，这就和主席的方針、政策背道而馳。

七、一九五三年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綫的講話，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經濟，发展合作社經

濟，限制、利用、改造私营資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針。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在刘少奇、陈云他們的主張下，还是让資本主义发展，这是搞加工訂貨，要保證資本家得到利潤。这也是和毛主席主張的限制、利用、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方針背道而馳的。

八、一九五六年的《論十大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建設的綱領性的文件。丰富发展并超过了馬、恩、列、斯关于社会主义經濟建設的理論实践。

九、一九五七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階級斗争的理論，提出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問題，即重工业、輕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問題，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針。

十、一九五八年提出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在这以前，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上，提出了十五年或者稍多的时期赶上英国的口号。

十一、一九五九年对“鞍鋼宪法”的批示，強調了党的指導，反对一长制，強調了政治掛帅，群众路綫，技术革命，敢想敢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走自己的道路。

十二、一九六二年在十中全会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矛盾，階級和階級斗争的理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指南。继而又提出了階級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以階級斗争为綱的三大革命运动。一九六二年是关键时候，刘、邓、陈、薄对三面紅旗刮冷风，不要階級斗争，不抓階級斗争为綱，搞分田到戶，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正是这个时候，主席重新提出了矛盾、階級和階級斗争。

十三、一九六四年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十四、一九六四年又提出了打破洋框框，甩掉洋拐杖，自力更生、走自己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当时針对我們的錯誤来讲的。

十五、一九六四年还提出了关于經濟建設和国防建設的体系和布局問題，也就是××××建設的問題。这个布局，关系到我們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一个决定性的战略問題。但是我們只注意到沿海，沒有人注意到內地。

十六、也是一九六四年，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針。

十七、一九六五年提出关于初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规划化的步驟問題。

十八、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提出了解放軍、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要成为革命化的大学校的伟大号召。这个思想，主席早在一九四三年的《組織起来》一文，和一九四五年《必須学会做經濟工作》一文就有了。

十九、主席关于放手发动群众，从下至上地全面开展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我国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行动的指南，是馬列主义又一重大发展。

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开始，拿我个人來說，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認真的。不懂得这个从下到上的群众路綫；不懂得、不理解从下至上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懂得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冲刷我們的黑暗面；不懂得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的发动，才能够揭发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真正根除資本主义复辟的危險；也不懂得，我們每个同志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特别是对于革命对象这样一个問題很不理解。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个人犯了不少錯誤，在实践中逐步認識，逐步体会，逐步提高，現在开始才懂得了一点，認識到这是主席对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对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貢獻。

以上讲的，仅仅是从一九四〇年起，現在二十七年中，我所知道的，不是主席的全部有关文章和指示，还有一些过去的重要講話沒有整理出来。这二十多年来，主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一系列的指示，大大的丰富，发展和超过了馬列主义的理論和实践。馬列主义的三个組成部分，哲学、政治經濟学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毛主席都大大的发展和丰富了，并且超过了他們。这样，也就大大地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and 胜利，对于巩固我国无产階級專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篡党、篡軍、篡政，防止資本主义复辟，保證我国坚持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积极地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保證我国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具有极为深远的伟大历史意义。我們必須很好地認真地反复地学习这些重要指示。我自己就是系統地学得不够，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犯了不少的錯誤。这是讲的一

方面，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另一方面以刘、邓、陈、薄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完全采取了与毛主席相对抗的路线。举出几点重要的我所认识到的，用我的水平来讲一讲，供同志们参考。

一、刘、邓、陈、薄是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分开来讲。只讲社会主义建设，不讲社会主义革命，不讲阶级斗争。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搞社会主义建设，抽掉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个根本问题，来谈社会主义建设。这样搞，名义上叫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这样的建设经济基础，随时都可以为修正主义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不讲远了，就讲文化大革命以来，为什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用经济主义来进行反扑呢？那不就是利用我们的经济基础来进行反扑？离开社会主义革命来谈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十二日，江青同志在讲话中，就谈到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指出上层建筑反过来可以巩固或破坏经济基础。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恰恰不谈上层建筑，只谈经济基础，恰恰不谈社会主义革命，只搞经济。

二、抛开生产关系，单纯谈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是提倡阶级斗争熄灭论。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就认为生产关系没有问题了。于是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黑《修养》中，提倡康有为的《大同书》，破九界。在八大决议中，他不是根据主席教导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只是提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生产关系适应先进经济没有问题了，只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落后了。

三、根本不讲政治挂帅，不搞群众运动，不搞四个第一，不是调动群众的积极因素，看不到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看不到精神可以变物质，而是见物不见人。不论在计划工作方面、财政工作方面、市场工作方面，都是机械的物的平衡论。陈云总是以三大平衡为他财政经济的一条杠杠，就是物质、财政、货币这三个平衡。这三大平衡搞好了以后，就在经济建设，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以确保这三个平衡。无论是他当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时候，或者是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当财经小组长的时候，都是在刘邓的支持下搞这个机械的物的平衡，短线平衡，依旧是主席在一九四三年就批评过的单纯财政观点，这样就完全违背了主席的教导，完全违背了主席的总路线的精神。

四、关于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强调条条的集中管理，强调搞托拉斯，实际上是搞一长制。违背了主席所指示的集中统一，分级管理的指示，和党委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的方针。因此，我们的工矿企业管理除了象大庆和少数的一些企业，象主席所说的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以外，很多企业在管理办法上，至今仍然实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

五、既然不强调政治挂帅，不强调群众路线，就必然强调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在工资、奖励、地区津贴和劳保福利等方面的有关分配问题，就有很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需要解决，但有些临时工则长期是临时工，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还是临时工。在半工半读方面，有些地方不是半工半读，实际上变成了顶班劳动，有些走上了资本主义超经济剥削的道路。这方面的斗批改要做很大的工作。

六、主席提倡科学实验，是三大革命运动之一，也就是说我们要搞技术革命，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培养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人才，建立自己的科学研究机构。可是，刘邓陈薄对技术革命，对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不感兴趣。提倡迷信外国进口设备，提倡爬行主义，提倡贾桂思想。而不是象主席所提倡的依靠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自力更生，打破洋框框，走自己的道路，这就说明，在科学研究领域中，也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

七、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群众的首创精神。当一九五五年、五六年、五七年这三年，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比较能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比较能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实现了合作社高级社的时候，刘邓陈薄他们就起来反“冒进”。“冒进”不仅是反对工业建设中间的“冒进”，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所谓冒进。当时反“冒进”是陈云、薄一波出面，刘少奇支持的。但是刘少奇没有自我批评，陈云没有自我批评，薄一波也没有自我批评，而由总理担当了责任。反“冒进”是刘邓陈薄的错误，不是总理的错误，应该平反。当大跃进取得伟大成就的时候，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出了一些偏差，犯了高指标的错误，他们就起来反三面

红旗，在七千人大会上吹冷风。七千人大会以后三个月到五个月，一直到北戴河会议都在吹冷风。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报告和主席、林总的报告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刘少奇反对三面红旗，只强调集中，而主席讲话，则讲民主集中制。说是在退，退到山坡下来了，现在要爬山了。林总讲话，指出我们难免不犯错误，付了代价是值得的，不后悔。刘少奇只是向后看。我们看到，在七千人大会上，刘邓陈薄继续吹冷风。在工业上，砍项目，压速度，降低攀枝花的项目。在农业上，提倡单干，提倡分田到户，提倡自由市场，到一九六二年，主席才扭转过来。

以后，经过主席的批准，订出了经济方面的八字方针：“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当一九六二年、六三年、六四年、六五年，在我们执行八字方针有成效的时候，在主席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大小三线建设，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大纲的时候，他们又起来反对“高指标”，又起来吹冷风。八字方针，刘少奇和陈云把它改成“非常时期”。薄一波把它改成“恢复时期”。

八、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时，主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加强国防、建设……，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主席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而刘邓陈薄简单地改成是解决吃穿用，与主席唱对台戏。

反“冒进”吹冷风的时候，在主席的支持下，我们顶过，有的顶住了，有的没有顶住。主席批评我这个人“软”。所谓软，我理解就是主席思想不挂帅，风格不高，原则性不强，斗争性不强。江青批评我随大流。的确，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也可以做些事，冷风吹得厉害的时候，我就不完全能顶住，就可以跟着犯错误。所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原则性，坚持斗争，这是很重要的事，很重要的原则。正如上次江青同志讲话中说的，她的好处就是懂得一点，坚持去做。我要向江青同志学习。

在文化大革命中，直到去年十二月九日提出工业抓革命促生产一条以前，以陶铸为代表，还是拿生产压革命。七月压一气，九月压一气。

长期以来，正如林总所说的，经济战线上，特别是工交战线上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尖锐的。经济战线上，是以毛主席的路线为主导的，但长期被刘邓陈薄所影响，每年小干扰一次，每三年大干扰一次。一九四九年至五二年经济恢复时期，刘少奇、陈云他们极力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一到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按照毛主席路线办事的时候，他们起来反“冒进”。一九六一年至六二年他们起来反对三面红旗。十多年来，每三年就大干扰一次，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能正确贯彻。很多同志，包括我在内，不是政治挂帅，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经济战线上，必须彻底批判刘邓陈薄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地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完成斗批改的任务。这个斗批改，牵涉到经济战线上的各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是艰苦的工作，是艰苦的任务。

几年前主席就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最近主席又指示解放军要支左、支工、支农。经济战线上，特别是工交战线上，最需要支援的就是毛泽东思想，而解放军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我相信，经济战线，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定会出现一个新面貌，一定会出现一个持久的、新的大跃进的局面。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定可以建成一个革命的、富强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永不变色。

另外关于支工、支农和支左中应当注意的问题，我有一个书面材料可以印出来供同志们讨论，我就不必讲了。

最后只讲讲支左问题，根据我的经验，提供一点参考意见，不一定对。从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过程来看，从去年到现在十一个多月来，开始起来造反的，敢闯敢干的青年，在工厂来说，这些青年有的是徒工，有的是学校刚刚毕业的技术干部，技术员，这些人敢说敢干敢闯，有的甚至成分不好，出身不好。比如现在我在计划委员会支持的那个左派，他们那个头头就是资本家出身。那里党团员多，干部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甚至干部多的，是不是左派？这些人恰恰是比较保守的，开始不是敢想敢说敢闯的，所以是不是左派，不是单纯看成分，而是看大方向，看敢不敢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敢不敢和当权派斗争，敢不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从大方向看他是不是左派，这一条仅凭我个人的经验提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我的看法如不对，将来事实再证明。

前言

十七年来，在经济战线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激烈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斗争围绕着下列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展开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获得全国性的胜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不失时机地把革命推向前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就此停步不前，使革命半途而废，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去？

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政治、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就此停步不前，放弃阶级斗争，实行阶级投降主义，听任资本主义复辟？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实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还是采取少慢差费的方针，使我国长期处于愚昧落后被动挨打状态？

在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斗争中，是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加强党的领导，实行政治挂帅，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技术革新；还是照抄外国，不要党的领导，实行一长制，实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依靠少数专家冷冷清清办企业？

在工交口，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同样是十分激烈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揪出了刘、邓在工交口的代理人薄一波及其死党，他们的末日已经到来了！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让我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摧毁刘、邓、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

下面所提供的材料，由于我们的政治思想水平不高，同时，时间比较仓促，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同志们将批评和建议转告我们，使其逐渐完善起来。

首都彻底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经济路线联络站

1967年8月

(一)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1949年—1952年)

一九四九年

三月五日，七届二中全会开幕。毛主席作报告，告诫全党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提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同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全面地、深刻地论述了党的各项经济政策，明确地提出了发展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限制私营资本，引导个体经济逐步向集体经济发展。这是在全国解放以前明确地提出来的经济方针，经济政策。

毛主席指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

又说：“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

又说：“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的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

又说“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又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又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阶级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极大的错误”。

四月二十四日，刘少奇跑到天津，竟肆无忌惮地反对毛主席的这一系列的指示。并且在天津、在北京、在东北各地，利用各种机会鼓吹资本主义，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工人阶级，大肆散布“剥削有功”谬论：

刘少奇对天津工作的黑指示中说：“……我们还希望你们开办工厂，多剥削一点。今天你只剥削一千工人，我希望你剥削两千工人，二万工人。股息就是剥削而来的，希望你们提高这个剥削”。

四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天津工商业家座谈会上大肆鼓吹“剥削有功”的反动谬论，鼓吹资本家要向工人斗争，他说：“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的更多，而是太少了。工人、农民的痛苦在于没有人剥削他们，你们有

本事多剝削，对国家人民有利，大家贊成”。

刘賊还說：“我在工人代表会上号召工人要分清敌友，如果反对资本家，那便錯了。要联合资本家，使生产发展，但除了联合以外，对资本家还須作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只联合沒有斗争，是不合事实的。我不但鼓励工人这样做，而且也叫你們资本家向工人作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你們必須要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将来你的厂子被工人斗垮了台，那时你就不能怪共产党不好”。

刘賊还說“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衡发展。我們也主张对私人资本有限制，但是今天有好些地方，說限制等于不限制”。“政府的方針，是要使国营私营互相配合，减少竞争，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这就是公私兼顧。也許将来私营生产会超过公营的，但政府并不怕，我們的目的是发展生产。……我們有所謂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 and 国家的长期合作，你有困难我帮助解决，我有困难你帮助解决，互相照顾，不是尔虞我詐，而是完全合作，彼此有益的。我希望合作的多，合作的长，使公私两利，不过这合作是完全自由的，并不强制”。“我主张采取这样的方針，就是从原料到市場，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做‘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賺’就是貫徹公私兼顧的政策”。

四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又大放其毒，他說：“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斗争的一面，有联合的一面。……但以那一个为主呢？今天来讲，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而是太少，太不发展。因为资本主义不发展，工人才痛苦。……所以要和他們联合，同时进行适当的恰如其分的斗争”。

五月十二日，刘少奇又在青代会上大放其毒，他說：“新民主主义不革你們（指资产阶级）的命，可以和平的，不流血地轉到社会主义”。

五月十九日，刘少奇又在北京干部會議上鼓吹：“但今天是社会主义社会，还允許剝削。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发达，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有其进步性的，今天资本主义在中国是进步的，不是反动的。你們剝削有功，剝削是进步的”。

六月十五日，我們伟大的領袖毛主席在新政协会議筹备会上講話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見，中国的命运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創伤，建設起一个嶄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六月三十日，毛主席发表《論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毛主席指出：

“我們現在的方針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

“沒有农业社会化，就沒有全部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須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須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問題”。

八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上公开对抗主席的指示，散布取消阶级斗争，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謬論。

他說：“我們今天不搞社会主义，将来还要搞社会主义。……但是我們中国搞社会主义可以不革你們（资产阶级）的命，可以不采取革命手段实行社会主义，也就是說可以用和平的办法走到社会主义”。

“你們必須要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争，将来你們的厂子被工人斗垮了台，那时你就不能怪共产党不好”。

九月二十一日，刘少奇在政协一届全体會議上他鼓吹社会主义革命是遥远将来的事情。

他說：“因为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是要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但是，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对这些事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很可以在将来加以討論”。

九月，刘少奇在天津教学人員座談会上解答問題時說：“将来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开矿、开办厂，在两利之下，也是允許的”。

十月一日，一輪紅日从东方升起，光芒万丈，我們最最敬爱的伟大領袖毛主席庄严地向全世界宣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十二月二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會議上指出：“在三年五年的时间，我們的經濟就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內，我們的經濟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一九五〇年

一月十三日，刘少奇对安子文、王甫的口头“指示”中又鼓吹“剝削有功”，他說：“現在剝削是救人，不准剝削是教条主义，現在必須剝削，……关內的难民到东北去，要东北的富农剝削他，他就謝天謝地了”。

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統一国家財政經濟工作的通知，把国家財政收支的主要項目作統一管理和有計劃的使用，克服国家財政上的困难，以利于人民經濟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四月十三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會議上毛主席指出：

“我們国家財政情况已开始好轉，这是很好的現象。但整个財政經濟情况的根本好轉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現有工商业的合理調整和国家軍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爭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的，那时就可以出現根本的好轉”。

四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會議上指出：“今后几个月內政府財經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調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門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現在已經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須澄清”。

四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在北京庆祝五一劳动节干部大会上的講話中說：“……这些企业的主人（指私营企业的主人）和工人群众也必須各尽所能，共同努力，以便把这些企业維持下去，等待情况的好轉”。“对于老老实实不怕花费一些资本和和气力去經營生产的事業家，人民政府应当給予他們以各项必要的便利条件。并給以指导，使其避免盲目性，帮助其事业成功”。

六月六日，毛主席在七届三中會議上作了《为爭取国家財政經濟状况的基本好轉而斗争》的报告，毛主席指出：“在統籌兼顧的方針下，逐步地消灭經濟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調整現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資关系，使各种社会經濟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經濟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經濟的恢复和发展”。

毛主席还指出：“財政經濟情况的根本好轉，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現有工商业的合理調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經費的大量节减”。

毛主席还指出：“这些条件是完全可以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內爭取其实现的。”

六月十四日，刘少奇歪曲党的政策，鼓吹“保护富农經濟”他說：“我們所采取的保存富农經濟的政策，当然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1950年6月14日《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

六月二十日，在政协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問題討論时刘少奇說：“雇人耕种的土地是否有限制？我們的答复是：‘沒有限制。’无论雇长工也好，雇零工也好，雇十个八个甚至一百个也好，只要是自己耕种或雇人耕种自己經營的土地，我們就应加以保护，不得侵犯”。

六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全国将出现土地的高潮。

薄一波（当时任华北局書記）則大肆宣揚“四大自由”（即自由买卖土地，自由雇工，自由信貨，自由貿易），极力鼓吹刘少奇的“不要怕冒尖”，提倡发展新式富农，說什么“农村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主张农村需要有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的謬論，公开反对毛主席的农业集体化的革命路綫。甚至在华北局的“指示”中公然提出“允許党员雇用长工”的反动主张。

十一月四日，刘少奇又說：“現在大家一齐来搞，为中国工业化而努力，当将来收归国有的时候，资本家的贡献越大，就越光荣。有些工业资本家問：‘国有化是不是可以早一点？’以为工厂是个負担。他說：‘我多开一个工厂就多剝削一些工人，将来罪过更大。’不是的，那是贡献更大，不是罪过更大”。

一九五一年

二月三日，刘少奇在全总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实行计划经济是很机械死板的，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也不行，不能机动”。

五月七日，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经过三年准备，十年建设之后，才能考虑何时进入社会主义，但也许还不能作答案，要看工业的成就……。社会主义主要靠国家工业化，没有工业化的基础，谈不到农业社会主义化的。党内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残余还很浓厚，要进行批评”，看刘少奇达到了多么猖狂的地步！

五月十三日，刘少奇在北京讲话竟说资本家剥削工人“剥削的好！”他说：“今天资本家办工厂，要多办几个，办得大一点。这是不是剥削呢？当然是剥削。但是这个剥削有进步作用，剥削得好！现在人民不是怕你剥削，而怕你不剥削。他叫你剥削多一点而不是叫你剥削少一点。我到天津的时候曾讲过，说你这个资本家，现在有几百个工人在门外等着，要到工厂做工。问题就是：‘资本家先生，我们请你剥削一下，我们要到你工厂里做工，剥削一下，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不让我工作，那就不得了！’工人要你剥削，请求你剥削，你剥削人家许可，不剥削人家苦得很，所以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带有进步性，它也能为人民服务，在这个时期，它能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一致，与国家利益一致。现在资本家不是这样吗？”，“我们那时搞实业救国就是搞的资本家为人民服务，现在资本家还可以为人民服务。……有些资本家他开工厂不是‘唯利是图，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富强，多搞一些工厂跟帝国主义争口气……这些资产阶级进步的时候，他这种思想是代表人民，为人民服务的，为国家服务，与人类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还有它的进步作用”。又说：“有些资本家向我提出过‘剥削者’、‘资本家’这些名字是不是可以改一下？……我说，好！改一下，那么改成什么呢？剥削者、资本家也很好，很进步吗？现在大家要请你剥削。这些问题不是我们故意这样讲，因为这是真理，真理就要宣传，不能隐蔽，向大家讲清楚了，不怕人家误会”。

又说：“中国共产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

又说：“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人，他要反动也是‘一念之差’，我们就有很多共产党员本来是想真革命的，但是后来当了叛徒跟蒋介石一道反对共产党。……所以立场的改变是容易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一下子可以改变过来，因此其他阶级也可以一下子改变过来”。又鼓吹：“现在是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将来要搞社会主义”。

又说：“将来我们要搞社会主义的，但是现在不搞，而且在最近十多年内不搞的，因为现在工业只占百分之十，要发展到百分之四十、五十，那你跑的怎么快，总还要十年、二十年……因此，如果现在就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把工业收起来，对人民没有利益，而且人民也不愿去这样搞。如果搞，就要伤害工业生产的积极性”。

六月，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鼓吹“没有工业化就不能有农业集体化”的谬论，他说：“农业要实行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工业的发展，不实现工业化，农业根本不可能实现集体化”。

十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由于上述三大运动已经取得的胜利，由于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国家已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国防力量业已增强。人民民主专政业已巩固。而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

“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毛主席指出：“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正在发展着爱国增产运动，是我们国家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农村中实现土地改革和在工厂企业中实现民主改革之后，工人和农民即获得发展其爱国增产的极大积极

性，并改善其物质生活和文化的可能，只要我们善于团结、教育和依靠工人和农民，我国就一定会要出现一个普遍高涨的爱国增产运动”。

一九五二年

元旦，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的伟大号召。

一月五日，周总理在政协委员会常委会上作报告，指出：

“不能孤立地讲公私兼顾，而一定要在服从国家经济领导的条件下，讲公私兼顾，不能抽象地讲劳资两利，而一定要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讲劳资两利。”

“工商界常常以行贿、欺瞒、暴利、偷漏税等犯罪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清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对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不堪设想的。”

一月九日，周总理关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

“……毛主席所号召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了。这是一个严重的紧张的革命斗争，需要我们全党、政、军、民的全体工作人员，以极严肃的、认真的和负责的态度，无例外地一致来参加这一运动，进行自我改造。”

四月二十一日，陈伯达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在全国解放以后，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向我们国家，向工人阶级，向全体人民进行了猖狂的进攻，他们梦想用偷偷摸摸的方法篡夺这个由伟大工人阶级领导的，经过千百万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人民共和国，梦想阻止这个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准备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上使中国恢复到半殖民地殖民地的道路。”并且指出：“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三反’、‘五反’运动后也还是要存在的。”

七月，刘少奇对留苏学生讲话，胡说什么：

“革命是搞的差不多了，敌人已经被打倒……要你们去不是要你们学习关于这个问题。你们学习的任务是建设，是使国家工业化，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

(二)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953年—1957年)

一九五三年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刘、邓、陈、薄、的重重阻挠，取得了国民经济基本好转的伟大胜利，恢复时期胜利结束了。我国革命和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民经济开始进入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开始了。

就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的时候，毛主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在当年三月，毛主席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

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歪曲主席提出的总路綫的实质，否认階級斗争，在全国統战會議上竟胡說什么：

“为了實現党的总路綫、总任务，要做很多工作，就是要进行很大的工业建設工作，要进行农业合作化工作，要进行手工业合作化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全国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了，就消灭了剝削階級。”他还胡說：“經過这种統战工作，资产階級、上层小资产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和政治代表就不会造社会主义的反，相反的，他們服从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就省了麻煩。”

反动成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繼續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对抗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在修改稅收政策时，竟然主张“公私企业一視同仁”，“公私企业一律平等納稅”“象荣毅仁这样的资产階級代表人物，还可以学恩格斯当党员。”进一步鼓励资本主义自由泛滥，使国营商业“大泻肚子”縮小批发。同年，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了全国第二次財經會議，会上揭发批判了薄一波的右傾机会主义錯誤，中央撤了他的职。毛主席曾当面給予严厉的批評，指出他的作风粗暴，沒有民主，工作飄浮不扎实，缺少馬列主义思想。但是薄在刘、邓的包庇下，并沒作认真的检查。

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給鞍鋼公司全体职工复电中指出：“我国人民現在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們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貢獻。希望你们繼續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經驗，發揮你們的智慧和力量，爭取更大的成就。”

一九五四年

九月十五日，在全国人大第一次會議開幕詞中，毛主席指出：“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經驗，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助互助，力戒任何的虛夸和驕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这样一个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設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將我国建設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刘少奇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却胡說什么我們在“国外还有許多困难”，“在国内也有困难”，“工业建設有困难，商业也有困难”，“由于这些困难，因此，需要各党派，各团体坚持、巩固統一战綫，克服內外困难，搞好我們的国家”。他极力夸大困难，并把克服困难的希望寄托于资产階級。

一九五五年

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綫的指引下，全国出現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新高潮。这个高潮是由农村首先开始的。毛主席天才地及时地抓住了这个高潮的最初的浪花，七月份在省市書記會議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告。

毛主席指出：

“我們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搖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評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規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針。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針，这是錯誤的方針。……我們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領導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毛主席又說：

“有些同志不贊成我党中央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針，……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的。……我們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

看，决不可以只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稅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輕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資金。而輕工业的大規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我們的有些同志却沒有注意，他們老是站在资产階級、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會議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发展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劃草案的决定》。會議认为：“这个計劃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綫的一个重大步骤。全党同志必須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增加生产，勵行節約，为完成和超額完成这个計劃而奋斗。”

七月三十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上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經济的決議》。決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主席主持拟定的我国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劃，是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綫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綱領。是和平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計劃。这个計劃所規定的方針，任务和政策都是正确的，投資比例和各項指标都是切合实际和合理的。这个計劃的实现，將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奠定良好的初步基础，从而促进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會議号召：“各級国家机关和全国人民必須繼續發揚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努力增产，勵行節約，消除各种浪費人力、物力和財力的現象，特别是基本建設方面，在保證生产工程和技术性工程的进度和质量的条件下，应该比用五年計劃規定的節約方案更进一步地節約投資和各項費用。”在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中，对我国工业建設的地区分布的原则，作了如下的規定：“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的产区和消费地区，并适合巩固国防的条件，来逐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态，提高落后地区的經濟水平”。

十二月，毛主席亲自主持編輯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指出：

“……現在的問題，还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

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語中指出：

“群众中蘊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着常規走路的人們，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們是瞎子，在他們面前出現的只是一片黑暗。他們有时簡直要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一种新事物出現，他們总是不贊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輸，做一点自我批評。第二种新事物出現，他們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

在《严重的教訓》一文按語中指出：

“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綫，在社会經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在《書記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語中又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問題會議上的讲话》中鼓吹什么，“資本家有些是能够做事的，甚至他的管理能力超过我們的共产党员，超过我們的同志，精明干练的人，懂技术的人不少。如果把他說通了，他也不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管理工厂，他也用我們的办法，用社会主义的办法来管理工厂，如果管的很好，那为什么不好呢？把资产階級說通了以后，改造之后，他比共产党管工厂管得好一些，这种情形是可能的。”

三反分子薄一波紧紧跟随其黑主子刘少奇大反毛泽东思想，他参加全苏工业工作者會議之后，极力鼓吹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技术。他大为宣传赫魯晓夫的修正主义論点，說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誰战胜誰的問題，主要在于搞經濟、搞技术、搞和平竞赛。为此就要学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技术。并說工

业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在刘、陈、邓的支持下以苏修为蓝本，搞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

并进一步鼓吹以“一长制”为中心的苏修办工业的一套管理制度，在国务院三办组成一个小组专门起草一长制条例。另外，还大力贩卖苏修的“专业协作”的经验。

同时，还组织人员搜集南斯拉夫的所谓“工人管理自治”的材料，推行修正主义的一套企业管理体制。

薄一波消极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国二次财政会上对他的正确批评，在国家建委成立大会上说：“一个机关要有个好领导，譬如一匹好马。我这个人用山西土话讲起来是一匹驴狗子。驴狗子赶不上马，但是没有马，只好用驴狗子。辩证法告诉我们，只要用，驴狗子也可以变成马的。”借此发泄他对党的不满。

一九五六年

一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发表不到半年，刘少奇、陈云、薄一波违背毛主席的告诫，继一九五五年大砍合作社的错误以后，又反起“冒进”来了。他们大叫市场紧张，把当时的大好形势，说成了漆黑一团。刘少奇还大肆贩卖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谬论，说什么“一个工厂一定要赚钱，不赚钱，就应关门，停发工资。”又说什么“计件工资制虽然不好，但却是一种鼓励生产积极性的好办法”。薄一波伙同陈云大反“冒进”，攻击“一九五六年某些地方冒进了，基本建设投资比去年增长近一倍，有不少东西显得很紧张，把各方面的材料都弄出来也不够，市场所需要的都挤掉了。”结果造成了“供求失调”，“最突出的是人民生活紧张，有了钱，到街上买不到猪肉，穿不上衣服，农民卖了农副产品买不到工业品。”

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听取了中央三十四个部的汇报，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创造性地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中国工业的发展道路。

毛主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求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重工业是重点，要优先发展，大家没有异议。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我们并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错误。……我们对轻工业和农业都是比较注重的。我们市场上的货物比较充足，同有的国家在革命以后的市场情况不同。我们的生活品，说十份够，也不那么够，但是我们有相当丰富的日用品，并且价格是稳定的，人民币是稳定的。这并不是说，现在没有问题了。也还是有问题的，就是对于轻工业，对于农业，比过去要更加注意，就是要适当地调整一下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要在工农业总投资中，适当地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重。”

毛主席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指出：“你究竟是想要发展重工业呢？还是不想？或者想得厉害，还是想得差一些？你如果是不想，那么就打击轻工业，打击农业；你如果想得差一点，也可以对轻工业少投一点资，对农业少投一些资；你如果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意发展轻工业，就要注意发展农业，使得生活品更多些，积累就会更多些，几年之后，提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也就会更多些。”

“发展重工业，需要有资金的积累。积累从哪里来？重工业可以积累，轻工业和农业也可以积累，但是，轻工业和农业积累更多一些更快一些。”

“把重工业的发展建立在满足人民需要的基础上，使重工业的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结果是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好些。”

毛主席又指出：

“发展内地工业是对的，是主要的，但必须照顾沿海。”

“沿海工业，技术高，产品质量好，成本低，新产品出得多。它的发展，对全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有带动作用。我们必须充分地重视这个问题。”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还说：

“技术干部不一定要科班出身。……应当相信，技术工人，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可以成为很好的技术干部。”

“你真想要原子弹吗？你就要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就要多搞经济建设。你假想要原子弹吗？你就不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就少搞经济建设。究竟怎样才好，请大家研究一下，这是战略方针问题。”

“给生产者个人必要的利益，给生产单位以一定的独立性。这对整个国家工业化好不好？应当是更好一些……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起来，把工厂的折旧费也都统统拿来，使得生产单位没有一点主动性，那是不利的。……那么多工厂，将来还要多，使得它们的积极性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来，这对我国的工业化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主席还谈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首先应当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重工业要发展，轻工业也要发展，就要有市场和原料，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巩固中央领导，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最后，毛主席又指出：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这个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

“我们提出学习外国的长处，当然不是学习它的短处。”

“不可盲目地学，要有分析，要有批判地学。不可以搞成一种偏向，对外国的东西一概照抄，机械搬用。”

但在刘少奇的支持下，薄一波对抗毛主席所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热衷于研究南斯拉夫的企业管理经验，几次邀请南斯拉夫大使馆人员来经委介绍“工人管理”和“企业自由化”的经验，企图按着修正主义样板来改造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

九月十五——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主席在大会致开幕词，指出：“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九月十五日，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薄一波在八大会议上的发言，是一篇反“冒进”的滥调。他说：“过多过快地提高国家预算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就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不良的效果，并且积累和消费之间发生脱节现象。今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今年国家预算支出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占46.7%，基本建设的工作是比上一年度增加62%，这是几年来基本建设投资最多的一年，也是建设工作突飞猛进的一年。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建筑材料和设备的供应不上，运输力量跟不上，不仅基本建设计划难以顺利地进行，而且还造成若干方面发展的比例失调，给国民经济的平衡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薄一波还说：“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每当我们想更多地搞一些工业建设或其它建设，而将国家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打得过大的时候，总是欲速则不达，反而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人为紧张。”

薄一波在清华大学传达“八大”精神时，大谈阶级斗争过时了，资产阶级改造了，大运动不会再有了，今后主要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先进的工业与落后的农业的矛盾，直

揚階級鬥爭熄滅論。

十一月十六日，劉少奇在人大常委第五十一次會議上說：“我們現在搞了一些國防工業，到底有沒有用處，值得懷疑。我們搞了許多飛機，大炮，花了很多錢，費了很大的力氣，將來沒有用處，那麼，我們就犯錯誤嘛。”公開反對發展國防建設。

十二月二十九日，劉少奇在人大常委第五十二次會議上叫喊：“整個的問題是，我們的步子跑快了一些，明年要稍許慢一點，快一點就發生了很多問題。”他還鼓吹讓資本家開私人工廠，說：“如果他一些，明年要稍許慢一點，快一點就發生了很多問題。”他還鼓吹讓資本家開私人工廠，說：“如果他一些，明年要稍許慢一點，快一點就發生了很多問題。”他還鼓吹讓資本家開私人工廠，說：“如果他一些，明年要稍許慢一點，快一點就發生了很多問題。”

劉少奇還在《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中大肆鼓吹物質刺激。他說：

“要求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增加個人的收入，改善個人的生活，這是完全正當的和必要的。只有這樣，勞動者的積極性才會不斷提高，先進生產者運動才能獲得鞏固的基礎。但是，現在有些企業和機關的領導者只是片面地注意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生產，卻不注意提高勞動者個人的收入，改善勞動者的生活，對於在生產上工作上有卓越成就的人們，也不注意給予充分的獎勵。這種傾向，無疑是必須糾正的。”

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這部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著作，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全面地、系統地分析了社會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

毛主席說：“在社會主義里，在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階級矛盾仍然存在，階級鬥爭並沒有熄滅。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貫串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建設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必須在政治戰線、經濟戰線、思想和文化戰線上，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毛主席從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出發考察社會主義的客觀規律，指出，矛盾的統一和鬥爭這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同樣適用於社會主義。

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促進了我們生產力的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一點，甚至連國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了。”

在同一篇文章中還說：“我們要進行大規模的建設，但是我們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這是一個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勵行節約，就是解決這個矛盾的一個方法。”

“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鬥的時間，其中包括勵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

毛主席又指出：

“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的社會主義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矛盾，就需要人們時常經過國家計劃去調節。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

“我們必須逐步地建設一批規模大的現代化的企業為骨幹，沒有這個骨幹就不能使我國在幾十年內變為現代化的工業強國。但是多數企業不應當這樣做，應當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並且應當充分利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力求節省，用較少的錢辦較多的事。”

毛主席在文章最後一段又重新講了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進一步闡明了工農業並舉，工業以農業為重要市場的著名論點。

他說：

“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

“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大家知道，輕工業和農業有極密切的關係。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重工業要以農業為重要市場這一點，目前還沒有使人們看得很清楚。”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七日，劉少奇在《關於赴蘇勞動考察團的報告的批示》中說：“我們現在還不禁止私人僱傭工人進行生產，允許一些私人生產事業發展也還有一些好處。”

劉少奇從三月到五月跑到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廣東五個省和上海市借著宣傳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大肆販賣階級鬥爭熄滅論的黑貨。懷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提倡學習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自由經濟辦法。這裡劉少奇同主席唱的完全是反調。

三月，劉少奇在河南的幾次講話中，公然煽動罷工鬧事。他說：“罷工是合法的”，“工會、黨員還應該參加”，“不參加就脫離群眾”。

三月二日，劉少奇在《在湖南省委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兩種所有制內部，必須按照按勞付酬所創造的價值，以促進生產力的順利發展。如果分配不公平合理，就要阻礙生產力的順利發展。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影響，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或者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公平合理就是既不能多，也不能少，飼養員工分低了，牛就養不好。社會主義里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主要表現在分配問題上。”

四月二十七日，劉少奇在上海黨員幹部會上說：“如何使我們的計劃經濟、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有這幾個特點：既有計劃性，又有多樣性，又有靈活性。提出這個題目，你看怎麼辦？因此要利用自由市場，一方面可以補助我們當前經濟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指導我們搞多樣性和靈活性。”

一九五七年五月，劉少奇在《關於高級黨校學員整風問題的談話》中說：“我們一定要比資本主義靈活多樣，而只有呆板的計劃性，那還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呢？”

他還說：“我們社會主義經濟特點是有計劃性，是計劃經濟，社會主義經濟應該有計劃性……但計劃性把多樣性、靈活性搞掉了，計劃只能那麼多樣，而實際上社會主義經濟生活是幾千種、幾萬種、幾十萬種。而計劃又不能計劃那麼幾千、幾萬……結果搞得簡單了，呆板了。……私人怎麼辦的，自由市場怎麼辦的，我們社會主義都跟上去，照樣辦，他去鑽空子，就是因為我們社會主義經濟有空子可鑽，……我們就照他一樣來填補空子。……增加地方企業自治權，個人活動的自由，自由的範圍必須有這個，沒有這個，就不能有多樣性，不能有靈活性”。

薄一波和他的主子劉少奇同一個腔，大肆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繼續大反“冒進”，拒不執行毛主席提出的發展重工業的方針。

一九五七年薄一波在經濟部門整風報告中根本不講兩條道路的鬥爭，同劉少奇散布一個腔調，大講階級鬥爭熄滅論。他說“階級鬥爭本領過時了，現在要學同自然作鬥爭的本領，學會搞經濟、搞建設，學會各方面所需要的技術知識，由外行變成內行”。

薄不聽主席教導，不去研究重、輕、農的關係，却仍然堅持右傾機會主義立場，繼續大反“冒進”把基建投資壓得很低，造成了經濟上的“馬鞍形”。

在東北出差期間，專門搜集“冒進”材料，以“鄭重”的筆名在《人民日報》上大吹冷風。說：有多少錢就辦多少事。

(三)大跃进时期

(1958年——1960年)

周托托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大跃进的三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从极左的方面和右的方面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社会主义制度、向三面红旗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更加激烈了。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批判了反“冒进”错误。毛主席指示要恢复“多快好省”、“促进会”、“四十条”。毛主席要求在几年内地方工业产值要超过农业产值。毛主席还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著名文章。南宁会议后，全国掀起了一个工农业生产新高潮，大办小型工厂的热潮席卷全国。

一九五八年春节时，毛主席又指示：用群众路线的方法，才可以多、快、好、省。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跃进，一个接一个高潮，是这样的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运动要反掉官气、暮气、骄气、娇气，才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毛主席还指出：政治是统帅，是人的灵魂，过去即是过分重视物，而忽视人的因素，材料稍有不足，敏感有余，政治不足。毛主席号召领导干部每年要下去四个月。

然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却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突出政治的伟大指示唱反调，二月二十七日他在太原重机厂对青年工人讲：“一个人要学会多种技术，在这个工种能干，在那个工种也能干……要好好学，多学几年，多学几种技术。”

三月四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指示中说：“现在反浪费反保守的群众运动，已经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方面开展起来。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国大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抓紧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这条纲，就可以把整风和生产统一起来，可以打掉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订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

三月八日，刘少奇在石景山却讲：“搞点副业好不好？正业还是要的，不务正业不行，但是不搞别的，不好，单打一不好。应该搞多种经营。发电厂又搞洋灰，也可以搞石油、硫酸氨，还可以制造发电设备。这样赚钱就多了，利润就多了。正业其实不赚什么钱，副业赚钱。你们还可以搞什么副业？围绕正业、不妨碍正业、又帮助正业，搞多种经营、综合利用。”

“资产阶级经济学不是也说以最少的劳动得到最大的效果（注：即利润）吗？”

又讲：“人是最活跃的因素。但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只见物不见人。就是将来搞技术，也要人先精神愉快。为此，就要把工人阶级的课题全面摆开。如招新工人的问题，学徒培养、工资、假期、劳保福利、房子宿舍，以至理发洗澡等，所有工人的问题全面摆开，然后再合理解决。”“仅仅管物资是不行的，一定要把人管得团团转，很活跃。自行车上按上滚珠，车轮就能转得灵活。现在工厂中不知有多少摩擦力都互相抵消了。按上滚珠以后，人转的很灵活，物才能灵活，整个生产力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他还极力鼓吹工厂要赚国家的钱。他说什么：“提倡工厂搞副产品。如苏联一个制火车头的工厂，火车头不赚国家的钱，而以附带生产留声机来赚钱养活厂子。苏联有许多大工厂都附带做刀子。”“我

们大厂原料很多，可以充分利用起来。”

三月二十八日，在成都量刃具厂他说：“学工在两年中要让他们多学几种技术，一辈子才好做事，要多打点主意。业余时间可以来学嘛，找个地方，多准备几张床子，找一个师傅教他们。……既然是两年，就一定要让他们多学一点，多学几门才好。”

三月，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一九五六年的十大关系，我们自己的经济路线从此开始。毛主席还指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在讲到“学习和独创”的关系时，毛主席指出：要坚持原则，同时要有独创精神。什么叫坚持原则，就是坚持兴无灭资的原则，要破除迷信，反对四平八稳，变盲目为自觉。前提是方向对头，世界上做大事的是青年人。

四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指出当时的大好形势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毛主席作了破除迷信等问题的重要讲话。会上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再次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毛主席说：“我看十五年或者稍多一些时间，可以赶上英国。英国有那么一点东西，一是算数，二是不算数。争取十五年赶上英国，可能的。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讲得好。这样的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我们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说俄国人的革命精神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相统一！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的现实主义相统一，不能说是狂妄。中国应该变成世界上社会主义强国。”

五月八日，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破除迷信”，资产阶级教授不用怕他，无产阶级教授也不要怕。“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实际做的许多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中国这样的革命，马克思没有做，我们做了，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未革成，我们革成了。”“青年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这样，“大概只要十几年的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为工业国。”

但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极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什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存在‘两种方法’的斗争，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也有两种方法的斗争。”

六月十七日，毛主席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上批示说“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应当完全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令，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六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又胡说：“现在（注：即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我国人民和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尽可能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这是一切工作的任务。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是如何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技术工人、老工人的工资又要高一点，要使人愿意学技术。”“工人学习优良的，可以调提出来，个别培养。”

七月十二日，刘少奇在石景山鼓吹计件工资制时说：

“计件工资制、等级、标准，原则上一般不增加，因为提高会影响全国，降低有自由。一个月发多少钱，一年发多少钱，你们包干，你们讨论个办法，看怎么合理。多拿了的人受攻击，少拿了的人主动了，有话讲，于是多拿的也只好让一步了。上包国家，下包群众，标准不准提高，调整中有高一点，有减一点的，势必多下一点钱，搞什么？可以用作发明改进的资金，用不完，半工半读增加人，可以盖房子，盖食堂、托儿所，叫公益福利事业，有很多事要办。”

“越包越先进，越包越负责，越包心越亮。越负责就是主人翁觉悟，那里有什么全民？六亿人怎么开

会？势必会有很多代表，实际是党的领导。是交给王鹤寿（注：冶金部部长）好，还是交给你周冠五（注：石景山钢铁厂厂长）好，我看苏联就吃了这个亏，采取甲乙两方的办法，互闹矛盾。现在我們交第一綫的人当家。”

刘、邓、薄对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建設社会主义的法宝恨之入骨。他們在新的形势下，妄图从极“左”的方面，用大刮五风的方法給三面紅旗抹黑，来达到他們搞垮三面紅旗的罪恶目的。七月五日刘少奇在石景山钢铁厂胡说什么：“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都是二年、三年。”

七月十八日，在石景山干部座談会上又讲：“工人做多面手的问题提出来了没有？工人高兴不高兴？前几年是前途问题，成了多面手就好了。”

八月十六日，我們伟大的領袖毛主席在視察天津时指出：“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

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工业的生产和建設必須首先保证重点。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生产的发展又决定于钢铁生产的发展。”会议提出了宏伟的奋斗目标：“为生产一〇七〇万吨鋼而奋斗。”同时指出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毛主席在会上强调：要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发扬优良传统。在讲恢复供給制的伟大意义时，他说：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給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調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

毛主席还特别强调政治掛帅，反对物质刺激，他说：“不出懶人，就是靠政治教育，政治掛帅，阶级斗争。”实行共产主义以后，人們就不发明了？不会的，发明就要給一百元錢，不对。我看越不給錢，发明越多。今年发明了那么多东西，誰給錢？計件工資制是一种不好的制度。我不相信实行供給制就不发明了，积极性就低了，懶汉就多，发明就少。我們搞了几十年供給制，恰恰相反。”

毛主席还指出：“干部要参加劳动。軍官也要当兵。”他说：“写个决定干部参加劳动。以后每年至少搞一个月劳动。不管党政军民都一样。”

南宁会议批判反“冒进”錯誤之后，薄一波把錯誤全部推給別人，并嫁祸于总理，自己装作正确，到处鼓吹高指标。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向主席建議，一九五八年鋼的产量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九月以后，他又到处鼓吹放“卫星”。并說：一翻两翻不算翻，三翻四翻是中游，五翻六翻是上游的口号，說什么只要一、两年就可以赶上和超过英国了。大刮高指标、浮夸风。

（注：他自己已經供认，他的目的是：“报上登了，完不成，看你們怎么办。”以此来攻击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攻击党的领导。）

九月八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談到国内形势时指出：“經过了伟大的全民整风运动，全国到处出现了蓬勃兴旺的气象。無論在农业、工业、文化教育以及其他建設事业方面，都形成了大跃进的形势。由于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九月份，刘少奇在視察江苏城乡时，把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中出现的，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歪曲为“为了个人幸福”，企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把工人阶级引向邪路。他说：“广大劳动群众……看到了个人幸福，依存于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崇高理想的实现，因而他們在劳动中表现了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

他还散布：“提倡”把“工資加奖励”的办法推广到工厂，还说：“社会主义劳动和教育制度就是由劳动部門联合招收新成员。”使“工厂出大学生，出技师，出工程师，出干部。”他恶毒地攻击大炼钢铁“花了很多力量，那么一点鉄，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高的，划不来。”

毛主席在九月份視察一些钢铁工业，做了重要指示：視察武钢指示：“象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为綜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和建筑工业等。

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視察馬钢时指示：“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为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比較快。”在安徽視察几个钢铁工业时指示：“安徽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沒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这是毛主席指示一条极为重要的方針。

毛主席在給冶金部的指示中讲“在工业方面，必須首先抓紧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因为这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基础。”

“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在钢铁生产方面，又必須一手抓鉄，一手抓鋼……。”

九月三十日，毛主席在視察了大江南北回京后，对記者发表讲话。他说：“此次旅行看到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该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經发动起来了。”但是：“到现在，我們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們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說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十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江南造船厂工人座談会上大刮五风，說：“今天看来，超过英国不要十五年，明年就可以了，超过美国也很快，五年到七年就可以超过美国了。这句话不要登报，登了报帝国主义要害怕，让他们睡睡觉，我們在这里干。共产主义会来得很快。”“到那个时候，我們就要超过美国，不但要超过一个美国，而且要超过四个美国。中国人口有四个美国，美国一年生产一亿吨鋼，我們要生产四亿多吨鋼，这样每人平均数就和美国一样，大家努力做，就会更快实现。”

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的武昌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头脑要热又要冷，这是統一的两个对立面。”“有人只爱热，不愿做分析，这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有些人爱冷不爱热，对一些事情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对于这些人，应当使他們的头脑慢慢地热起来。”

十二月份，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大刮浮夸风，胡說：“明年鋼如果达到三千六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达到八千万吨，到一亿吨，甚至到一亿二千、三千万吨，一九六二年的发电能力就不是现在的二百多万瓩，就能达到三千几百万瓩，电力化就容易了，那时机械制造能力要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鋼明年达到三千万吨，一九六〇年就可以达到六千万吨，超过了苏联今年的产量，这就叫做自由，就叫过了关了。”

一九五八年底薄一波主持搞了一个一九五九年鋼产量达到××万吨的计划，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的武昌会议上受了主席的批評，把鋼产量由××万吨，改为××万吨。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薄先是仍坚持鋼的产量保证××万吨，争取完成××万吨。可是就在他讲话的当天下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叫起困难来了，推翻了××万吨，改为××万吨。毛主席說：“你上午报告，下午就被推翻，你坚持一天也好嘛！”

一九五九年

一九五九年二月，毛主席教导对1958年大跃进要有正确估价。他指出：“有的人讲起去年的缺点，讲了几十条，一无是处，成績沒有了，这是形而上学的看问题，其实这些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所謂形而上学：（1）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不从内在联系看，不从世界是統一的来看，而是互不相干，互不联系，象沙子一样；（2）从表面看不从实质看，从形式上看不从内容看，从现象看不从本质看，静止的看不从发展看，不是透过表面看实质，透过形式看内容。”“不管你考察多少厂子，有多少缺点，归根到底也不过十个指头中的一个。”“不应该否定一切的，凡否定一切的，結果统统毁灭了他自己，因此要做教育。”

毛主席說：我們可以說从1956年开始創造了我国工业（包括交通）、农业两方面跃进，开始找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則的門路。1955年合作化以后，人民热情起来了，有希望了。毛主席还说：我們在

1958年大跃进是基本适合的，至于具体数目多一点少一点是另外一回事，但证明可以大跃进。毛主席对总路线解释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两句是精神状态，主观能动性，多快好省是搞物质。他说：“虽然在实践中有缺点，但在斗争中认识了客观实际。”

毛主席一九五九年二月在郑州会议上对1958年形势估计说：“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不论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交通运输战线上，商业战线上，文化教育卫生战线上，国防战线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显著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地建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地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地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定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毛主席对经济建设问题还指出：工业建设要有重点，才有政策，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对事物的观察又深入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这个分析很好。

在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七日，柯庆施同志召集的上海市委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讲：“我们要利用好条件，有利于和平，有利于我们的国际形势，在经济上竞赛，远远把资本主义抛在后面。”

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对一九五九年计划作了落实。

毛主席四月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讲关于工作方法时指出：要波浪式的前进。作计划时，打仗，休整，又休整，打仗。毛主席教导说：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一个人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领导者要听少数人、反对者的话，一个人觉得自己是真理应坚持。

会议公报指出：“一九五九年的计划编制，对于我国物质技术的客观可能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的主观能动性，都做了认真的考虑。中央委员会深信，在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我国人民继续发扬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充分发挥各方面的潜在力量，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一定能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

五月四日，邓小平在接见匈牙利青年代表团时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他说：“总路线的提出，首先是根据苏联及其它兄弟国家的经验。”“我们提出了几个并举，有好几个并举不是我们创造的。”“大跃进也有大量缺点，两面都要看。”“说没有缺点是假的。”还别有用心地说：“缺点从报上找不到那么多，报上不能讲那么多”。“一听到开会，就知道我们这里有问题。”

上海会议后，薄一波又散布比例失调论。一九五九年五、六月间连续在一机、煤炭、轻工、交通等部门召开的电话会议上，大讲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大喊“寅吃卯粮”、“得不偿失”，刮起一股冷风。并指责冶金部说：“钢铁翻一番是你们冶金部向主席提出来的，你们是叫化子打狗，专门操练这一行的。”

五月，薄一波在煤炭干部会议上说：“毛主席要我们多谋善断。过去是少谋或无谋，结果是武断。……因为过去计划指标高，弄得大家喘不过气来，情绪不高，关系不好，努力数月，结果是月月完不成，月月欠债。不正常生产，最后就要垮台。”

薄一波公然对抗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总路线，胡说“要以大中型为纲，以小为辅，小土不搞、少搞”

八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八届八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会议总结了执行总路线的经验，检查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情况，提出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的号召，会议指出：要大反右倾，大鼓干劲，要坚决克服某些不坚定分子的右倾情绪和坚决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全会还号召全党全民为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实现今年内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毛主席八月在八届八中全会上讲政治与经济关系指出：为什么从此谈起呢？因为历来一讲政治问题，就不讲世界观。其实政治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宇宙观，不谈不行，一切要从这里开始。政治是什么呢？按列宁说法，政治是上层建筑，技术措施是生产进行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技术部门是组织生产、发展生产力的。政治挂帅是上层建筑，不挂帅，我

看不行。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是保护经济的，是促进生产发展或是阻碍经济发展。

毛主席在八届八中全会上还说：中国要搞大跃进，速度要加快，这是形势要求，群众要求，又有可能，有条件。毛主席指出现在是两种运动，革命和建设两种东西纠缠在一起。革命是人和人的关系，建设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是生产力变革问题。“不管出什么乱子，代表无产阶级和六亿人民意志的总路线是要占优势的，一个时期不占优势。过一个时期又起来。”

毛主席还说：“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讲道：害怕群众运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本性，他们在运动面前专门挑剔缺点、夸大缺点，目的是散布松劲、泄气、埋怨、悲观情绪，否定成绩，否定党的总路线。

一九五九年，刘少奇、薄一波借毛主席退居第二线的机会，攻击毛主席。刘少奇给胡乔木下达指示说：“主席的话不要用‘教导’‘指示’等词”。

“中国也要反对个人崇拜，不要喊万岁，不要唱东方红。……我现在要搞邓小平同志的个人威信，……我没有损坏彭德怀的威信。……看来他革命是要革的，社会主义也是要革的，但是怎么革法，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有他自己一套方法、路线。”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刘少奇又说：“没有若干个人威信，革命胜利不可能，建设也不可能，已建起来的这种威信破坏它，就等于破坏革命，为反革命效劳。”“我过去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现在不搞了，搞邓小平的个人崇拜。”

九月庐山会议召开前，薄一波要薛暮桥、孙冶方为他收集比例失调材料，并加以理论分析，然后送给他，庐山会议把彭德怀揪了出来，薄一波又伪装成一个反右倾的“积极分子”，主张生产要大上，指标要提高。

八月二十六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周总理作了“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严肃、认真地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谰言，周总理强调指出：“必须同一切实际存在的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进行严肃的斗争。”

在一九五九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为了掩盖他右倾机会主义的面貌，在生产上提出形“左”实右的主张：“生产就是逐月上升，过去总是第四季度生产完成得好，到第一季度就下降，一季低于四季，就是小小的马鞍型。要消灭这个一季低于四季的老常规，要消灭这个马鞍型。”薄一波当即提出：“开门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这个口号破坏了设备的正常检修，对生产带来很大的损害。

九月十六日，《红旗》杂志发表林彪同志文章《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文中指出：“在人们的头脑中，不是社会主义思想占领阵地，就是资本主义思想占领阵地，因而在过渡时期，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始终是军队建设的主要课题。”“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两种政治思想斗争是象波浪一样起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今天，这一斗争还没有熄灭。”强调指出：“政治是最根本的东西，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不作好，其它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他号召：“每一个革命者必须在思想领域进行不断革命。”指出：“害怕群众运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本性，他们在运动面前专门挑剔缺点，夸大缺点，目的是散布松劲、泄气、埋怨、悲观情绪，否定党的总路线。”

九月二十八日，刘少奇讲，要同“一切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进行和平竞赛。”

十月十六日，《红旗》杂志二十二期发表了陈伯达同志的文章《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文章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的反抗。”“这次我们全党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斗争，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因此必须进行”。“现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和党从来就存在原则分歧，在民主革命时期，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革命方法上。但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问题已经不是革命方法上的分歧。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坚定地领导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相反，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实际上要

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要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一九六〇年

毛主席亲自写出十年总结提纲，对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而伟大的总结。总结中指出：“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犯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公开改正。我党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

一九六〇年，刘少奇、薄一波借口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同时又利用技术革命搞乱生产秩序。

一九六〇年一月，刘少奇在与王光英一家座谈时讲：

“很多人去过苏联，写文章正在说苏联自由化，欣赏苏联的物质刺激，说中国才是马列主义，说我们是革命的马列主义，苏联是保守的马列主义，这就需要注意，他们在挑拨我们和苏联的团结。”

“不能没有个人利益，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就是整体利益……不考虑个人利益，最后则有个人利益。”

二月份，刘少奇讲：

“技术革新搞得好的，要给一点钱，但不要宣传，人家看了确实他搞得好，你不信群众觉得不公道。物质利益不讲在前面，讲在后面，群众不计报酬，管事的人还是要计报酬。”

二月，在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又宣扬：“我们的政策，高薪不变，调职不减薪，如果因为调职而降薪的要改过来，恢复原薪，补发。”

一九六〇三月，毛主席批转鞍山市委的一个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鞍钢宪法》五项原则，即：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不断发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确定了中国自己办企业的道路。

毛主席指出：“现在（一九六〇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且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鞍钢宪法》提出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公然与毛主席大唱反调，他别有用心地说：“《马钢宪法》也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并且明目张胆地指示冶金部不准宣传、贯彻《鞍钢宪法》。不仅在冶金部而且在经委机关和整个工交系统也是这样，从六〇年以来，对《鞍钢宪法》严密封锁拒不执行。在东北局召集起草《七十条》的座谈会上有人以《鞍钢宪法》五项原则为基础制定工业企业管理条例时，薄一波大发脾气的说：“不能光喊口号”。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在视察河北省时，竟然明目张胆地大肆鼓吹说：“继续努力，在技术上力争第一”。他在同安子文的一次谈话中，继续鼓吹说：“为了培养专家，可以不让他们入党，不让他们参加政治活动。……苏联培养李森科就是这样做的。”

五月五日，刘少奇在成都量具刃具工厂说：“有奖励没有？”“物质刺激还是要一点的嘛！”

五月，刘少奇在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命现场会上说，一九五八年和五九年大跃进“到了六〇年初，”“由于劳动力和物资不足”，所以产生技术革命，“五八年和五九年是依靠增加人和延长劳动时间实现跃进的。”

薄一波对年初工交部门出现了大搞群众革命运动不是按着主席的指示：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而是瞎指挥，派出大批人马来督战，去召开现场会去搞什么“煤气化”、“管道化”、“超声波化”等等，接着又要求“几天革一个命”，“或者一天革几个命”，“实现四化”等等。他还以中央名义转发了不少文件。一下把技术革命给搞乱了套。薄在技术革命出来一些问题以后又放手不管了，把技术革命口号也取消了。

五月二十六日，刘少奇鼓吹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搞托拉斯，他说“要组织托拉斯，综合性公司，联合经营。”“这些是生产关系的改进。”“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可取的地方，花钱少，效果大，精打

细算”。

薄一波召集工交部门负责人在钓鱼台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违反毛主席的指示，不联系思想工作实际，不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这本书进行批判的学习，却聘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为顾问，大肆贩卖价值规律和利润挂帅等修正主义的东西。

九月至十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同志作了重要报告《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

十月一日，林彪同志发表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林彪同志指出：学习好毛主席著作，“将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地前进。”

一九六〇年六月，刘少奇在机械工业上海现场会议接见各省市代表团团长的报告中讲：

“庐山会议一开，还要跃进，不跃进就是右倾。但劳动力没有了，物资也不够了，又要跃进，又没有，那有什么办法呢？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靠技术革命。这是社会劳动力已经全部利用又要跃进的产物。”又说：“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的产生是由于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劳动力、物资不足而来的。”借以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大跃进造成了劳动力和物资的不足。

七月，苏修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內撤走全部在中国的专家。刘少奇认为我们自己就无法搞建设了，他悲观地说：“专家撤走了，我们自己能搞得起来吗？”因此主张大批建设项目下马，说：“不能立即赚钱的，显不出经济效果的，一律都停建。”对已经投入生产的厂子也说：“如果不能赚钱，或者亏本的，一律停办，不停办，扣发工资。”“对国防重点建设项目也要停下来，少建一些，放慢一些。”

(四) 调整时期

(1961年—1963年)

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由于苏修背信弃义撕毁了全部经济互助协定，撤走了全部的专家；也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工作中产生了若干缺点错误，我国的经济建设遇到了暂时的严重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以及他们的总代理人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之流，错误地估计形势，自以为时机已到，便大肆活动，猖獗地攻击三面红旗、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系统地提出了“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的国内外政策、路线，妄图恢复资本主义。

但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统帅下，中国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又大踏步地前进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一九六一年

一月十四—十八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全会提出在工业方面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毛主席在一月十八日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是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矛盾未改。现证明是阶级斗争的矛盾，是两条道路的矛盾。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天下，还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天下？我们情况要明，决心要大，方法要对。”

毛主席在会上还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他说：“希望1961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兴实事求是之风。在实际中来摸客观规律。”中央号召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进行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并重新

印发了毛主席在1930年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

毛主席在会上还批评道：“农轻重关系，两条腿走路，讲了五年了未实行，今年可能实行。庐山会议讲了，未实行，今年可能变为现实。但还要看，见诸实施。”

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发下《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主席号召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总结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毛主席批判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要大家学习斯大林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主席对前三章做了批驳，也是批判，也是总结了中国的经验。这些都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理论上作了极为重要的论述。

五、六月间，毛主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党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而刘少奇却大罵大跃进的高速度是“脱离现实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高速度”，是“反对客观规律的‘唯心主义’”。还叫嚷“当前的困难、天灾人祸两个都有，而且在很多地方，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你讲天灾，群众不承认。”“天灾是一片、人灾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

邓小平则大肆散布“紧张论”。他说：“生产关系紧张，党群关系紧张，干部关系紧张，所有制关系紧张，三年来所有制关系破坏了，积极性破坏了。”并恶毒地攻击毛主席说：“不要老说（缺点错误）一个指头。”

刘、邓、薄之流到处游说，攻击三面红旗，恶毒地把矛头直指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什么：“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有些人有怀疑，抱怨、牢骚讲出来好。不要人家一怀疑就不让讲话。又说实事求是，又不允许怀疑不允许讲老实话，这是不对的……对三面红旗要看三、五年再作结论。”“有人说比例失调，这也没有什么，不适应就是失调。”

（7月17日刘少奇在听取东北局汇报时插话）

“过去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经过上级批准，没有说废除，就不执行了。……这也与上面有关，如号召敢想敢干、大破大立等，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都废了，我们上面同志很长时间不了解这个情况，这是吃了亏的，国家吃了亏，党吃了亏，你们吃了亏，老百姓吃了亏。这件事应当接受经验教训。”

（1961年7月刘少奇在伊春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三年调整，以煤为主，煤不够了就关、并、搬一部分工厂。煤保钢铁保一切，要各行各业让路，典型试验，根本问题是企业管理问题，整风只解决一部分问题。工资制度：（1）计时工资加奖励；（2）计件；（3）小包工。”

（1961年7月邓小平在北戴河会上讲）

要自负盈亏、独立核算，按照经济的办法去搞经济工作。……用等价交换去迫使（企业）搞好独立核算，提高生产。

（1961年7月邓小平在黑龙江省委一次会上的讲话）

大跃进的群众运动是“违反群众路线的群众运动”，是“大呼鲁”，“形式主义”。

（1961年邓小平讲话）

“企业用月工资七十元的工人去搞农业怎么行？成本太高。亦工亦农是不行的，工人搞农业花不来，亦农亦工还可以花得来。”

（1961年8月在海拉尔市林业干部会上的讲话）

“目前，不仅扩大再生产有问题，而且简单再生产也有问题。设备维修不好，没有物质准备，原料供应经常中断。……再这样搞下去不行了。过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会发生危机，现在看来，搞不好也会发生经济危机。”

（薄一波向刘少奇谈：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问题。刘说，先搞简单再生产，再搞扩大再生产，先搞维修，再搞制造）

刘、邓、薄为了对抗《鞍钢宪法》，在毛主席提出《鞍钢宪法》不到一年即1961年初，就合伙泡制修正主义的《工业七十条》。薄一波主持起草《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七十条），在起草前先组织一批人下去调查，薄投意着重搞生产力的问题，和业务技术管理工作问题，不管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由别人去搞。在起草过程中，薄又以“治乱”为指导思想，否定毛主席办企业的根本思想《鞍钢宪法》，

否定三年大跃进的經驗。他大吹冷风，说什么：经过三年大跃进之后，我国工业战线上存在的主要问题：“生产秩序混乱”，“瞎指挥、乱操作的现象严重，许多设备受到了损坏”“不少企业亏本赔钱”，“工资奖励制度存在着平均主义倾向”“党委包揽行政事务过多”等等。他主张大力恢复旧的规章制度，把企业管理拉回一、五年走过的老路。根据这种指导思想起草的“条例”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挂帅，而是主张经济技术挂帅，宣扬物质刺激，不强调党的领导，却反对党委包办代替，变相恢复“一长制”，不提两参一改三结合，却大谈严格分工的责任制度，根本不提大搞群众运动，却讲什么扎扎实实、循规蹈矩的正常秩序，不讲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却讲什么合理化建议和技术革新。把毛主席办的一个反动纲领。《七十条》与《鞍钢宪法》相对抗，是在工交企业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七十条》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力赞许。邓小平在7月书记处会议上，亲自逐条推敲修改。

《工业七十条》出笼后，遭到广大职工和革命干部的强烈反对。毛主席提出了严厉批评，指出要修改《七十条》，但刘、邓、薄采取了公开对抗的态度，充分暴露了他们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千方百计复辟资本主义的真面目。九月，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讲道：“我们的经济困难已经到了沟底，再往前走，就陆续上升了。”

邓小平在庐山工作会议上却攻击三面红旗“违反了客观规律”，说“现在实际上是一个半瘫痪状态，总要有个时期，才能恢复原有的生产能力。”

刘少奇在谈到总路线时说“思想统一没有？我看没有，要有一个过程。集中于怀疑总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这一条不要紧，天要下雨，姑娘要嫁人，只好让他怀疑。”

刘、邓、薄极力吹捧资产阶级，扶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大搞物质刺激，物质奖励。

十月二十二日，刘少奇在禁止商品“走后门”会议期间大肆放毒，他说：“如果有人大搞资本主义，请他出来搞。社会上有点资产阶级也很好，这批人积极得很，会钻空子，他们可以补我们的缺陷，甚至有的开地下工厂也好，他们生产的东西，除了骗人的以外，都是有用的。他们钻空子发财，恰恰是发现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空子补起来。”

十一月，刘少奇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又说：“可以考虑允许一批商人出来，开放一批给他合法化，让他搞。这样危害性并不大。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一次消灭是不可能的。苏联搞了两次，还没有消灭。我看搞几次是合理的。”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薄一波在“采煤”工作中，批准煤炭部4条措施：

1. 把大跃进中破掉的计件工资恢复起或改为计时工资加奖励；
2. 多劳多得、多劳多吃、多劳多用；
3. 减人不减粮，大搞奖励粮；
4. 可以自行以物易物。

这一年，薄一波支持煤炭部搞了几十种奖励制度，把工人引向邪路。

十一月，薄一波伙同陈云召开的钢铁座谈会、煤炭座谈会对于打破洋框框的一些措施一律要求复原。

十一月，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薄一波在刘、邓支持下，作出关、停、并、转的决定，把钢铁、煤炭、化工、机械等小型企业几乎全部砍掉。这是对毛主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导，对总路线的一次严重的反攻倒算。

十二月十九日，邓小平在工业书记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公然散布对抗毛主席的言论，自命不凡。他说：

“基本建设分散，痼病头多，资产分散，这是少慢差费。在庐山会议时，我讲要集中三年。毛主席问我为什么？我说试试看，实际上不是三年。”还诬蔑大跃进说“三年大跃进的后遗症，要我们花几年（三年？）时间来调整。”

年底，邓小平竟然公开说：“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哪儿呢？前几年还可以看出优越性，这几年不行了，不能吹牛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咀脸暴露无遗！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二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达到顶峰，刘邓黑司令部公开提出“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更加肆无忌惮地攻击毛主席，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掌舵，拨正船头，对准航道，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的航船绕过重重暗礁，继续乘风破浪向前迈进。

一月二十六日~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党中央内围绕着“三面红旗”展开了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

在会上毛主席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又说：“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实践，在实践全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毛主席号召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调查研究，下一番苦功弄清生产建设规律。

又说“我们充分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而刘少奇却在会上把三面红旗说得黑漆一团，公开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社会主义。叫嚷要把三面红旗当作“历史教训”来总结，他说：“主席讲形势大好，是指政治形势大好，经济形势不能说是大好，是大不好。……两三年前，我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許多。”又说“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全国有一部分地区，缺点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过去了，好象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大病基本上已经好了。”

“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全党的干部、全体党员，以至绝大多数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经验，都有了切肤之痛，饿了两年饭。”

又说：“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回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工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的现象。”

在工业方面，任意废除规章制度，任意推行一些不切实际、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使设备损坏，某些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下降。”

“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都是缺少根据或者没有根据的，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没有同工人和农民群众，同基层干部和技术专家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在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就草率地加以决定，全面推广，而且过急地要求限期完成，这就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违反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我们这几年

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五年计划犯了严重错误，重点是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骄傲，违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作风，削弱民主集中制，指标过高，不适当大办，搞很多独立体系，农村中违反等价交换，按劳取酬，过火斗争，群众干部不敢讲话，地富反坏混入党内，进行破坏。”

“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轰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是从那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轰起来了。这种方式，是不好的。……‘敢想、敢说、敢做’的那个‘做’不是说一下子在全国去做，而是指在小范围内去做，先做典型试验。”

“这几年不节省群众的干劲，浪费了群众的许多干劲，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同志们甘心群众的干劲发动不起来，这是目前应该很好地进行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这几年，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受了挫折，在某些地方受了严重的挫折。”

“这四年我们经过一个大波折，开始糊里糊涂，现在情况一天天清楚。……我们中央同志的看法就不一致，公开的反对是可以的。……甚至提出自己的路线纲领都是许可的。”

甚至煽动说：“对于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我们现在来总结前几年的工作，恐怕总结不完，我们后代还要进行总结。”

又公开叫嚣：“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

中央会议之后，他们又召开西楼工作会议，阴谋策划于密室之中，企图扭转我国社会主义的航向。

二月，刘少奇在西楼工作会议上讲：“四年财政赤字××××实际还不止。所有假象，都要揭。……工作会议时困难情况，揭露还未透底，有些同志还不愿揭，我们对困难还未完全认识。”

“为了解决天灾人祸，要有紧急法令，现在我们的确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不能按常规办事。……要搞点非常措施，同意搞财经小组，有时××抓，小平抓，我抓，硬是要搞独裁。”

“基建除了某些必要的外，都停止，两三年踏步。……减少基建，腾出材料搞市场。……要把市场放在第一位。”

“处在什么时期。现在方向不是搞十年计划，老老实实克服困难，否则方向不对。现在调整很困难，不采取非常办法不行。我提现在是非常时期，非统一集中不可。如煤炭、木材用在那里，都要统一抓，派人去，钦差大臣满天飞也不怕，只要把工作搞好了。现在不同于52年，情况复杂很多。大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采取非常办法。我们虽然不同，非常时期，要有非常办法，在小范围内讲，公开不讲，领导集团内部要统一思想，要提争取三年到五年财经情况基本好转。”

“银行、财政制度，搞个文件条例，限期交卷……送中央。三面红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不写，只写什么许可，什么不许可。”“制度要快些恢复起来，没有新的，就恢复旧的。”

“投机的人可发执照，替他运，收费高一点，否则，它走后门。”

“总的说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目前说长远服从暂时，不然过不去。”

邓小平也在会上同刘少奇一唱一和，为“非常措施”出谋划策，说要控制劳动力、工资和亏损企业，“财政、银行要卡死，”企业要“搞经济核算”（自负盈亏），胡说什么解决困难的“根本办法”是“放慢建设速度。”

三月五日刘少奇又说：

“对于困难，我们还没有认识清楚”“目前财政经济困难是严重的”工农业生产“还要继续下降”，“比例失调”，“货币贬值”，“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什么叫困难时期，就是农民暴动时期，这样的困难时期过去了。”

“从去年到今年一年中，从中央来说，对严重形势估计不足……”

含沙射影地攻击毛主席说：“不愿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承认九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就容易解决问题，对于困难不是认真对待，而是掉以轻心，很明显，这不是真正的勇敢，绝不是革命家的气概，绝不是马列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恶毒之极，是可忍？孰不可忍！

三月二十七日~四月十六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京举行，毛主席出席了这次大会，周总理

遇。主张搞总会計师、总經济师制度。

薄一波极力吹捧和推行彭真一手搞的所謂北京市“五反”运动經驗。它的經驗就是从反浪费入手，只反经济，不管政治，是违背毛主席階級斗争思想的。

一九六三年，刘少奇、薄一波继续攻击总路綫、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刘少奇攻击毛主席、总路綫、大跃进說：“看来現在提倡比、学、赶、帮的方法，比过去只抽象的号召鼓足干劲，力爭上游的方法好，盲目性会少一点。如果提倡得过分，也可能产生盲目性”。“过去基本建設战綫太长，项目过多，要求太快、太急……一心搞扩大再生产，忽视了简单再生产。时间，在生产方面，只注意增加数量，忽视质量，提的指标过高，超过设备可能，本来可以用十年的设备只能用五年，设备损坏过多，又不注意維修……造成不好的后果。”

(1963年10月薄一波汇报时刘少奇插話)

刘少奇把他的资本主义經營思想說成是我国办企业的經驗。

一九六三年九月，对柬埔寨宋双的談話时，他讲道：“还有个經營管理問題，如果机关、学校、工厂經營管理好，人的精神面貌就会好，群众热情就会高。工作作好了，生产也提高，就可以多賺錢。如果說經營管理不好，办事人員精神不振，群众热情不高，就会賺錢少，或亏本。我們的經驗大概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秘密。”

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了陈伯达等同志起草的《关于工业发展問題》的文件。陈伯达同志曾讲：

“管理工业企业，主要須用经济办法，建議可考虑利用托拉斯这一类生产、交换和科学实验的綜合性組織形式，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是用经济办法管理工业企业的一种組織形式，可經過典型試驗，先在某些行业或在某些城市，組織一些托拉斯式的联合公司，以便取得經驗，逐步推行”。

而刘少奇伙同薄一波借此机会发出了在全国大办托拉斯的总指示。他們打着“社会主义托拉斯”这个招牌，以“经济办法管理企业”为名，实际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把工交企业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企图最后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在关于工业管理体制問題的談話中說：“只搞地区的公司不行。省、市范围成立公司行不通，大区成立也行不通，各行各业全国搞一个。”

十月，在薄一波汇报时刘少奇插話說：

“你們有局，下面有厅，要全国統一，不受地方干扰。地方政府只搞监督，可以抽附加稅，搞市政建設，这个問題，已有资产阶级成功的經驗。”

“用行政机管，不如用企业管，要認識这个問題，资本家怎样管企业，资本家管工厂总算管得好的，垄断公司内部沒有組織。我們的管理方式應該比他們进步……不能比他們更坏一些、差些，成本更高，矛盾更多，比他們落后一些。”

“企业要搞经济核算，管企业，资产阶级有几百年的經驗，……組織企业公司，可能比行政机构管理好一些。”

“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經驗，特别是垄断企业的經驗要学习，苏联好的經驗也要学。銀行、邮政局、托拉斯、新加坡、国家资本主义等等，……考虑一下，如何管理好。”

“組織全国的专业总公司，……一机部不是很难管嗎？你組織几个总公司，垄断这一行。比如电气，美国有通用电气公司，它还不是完全垄断，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垄断得更厉害。”

“美国石油有几亿吨，在国外也有，也是几个垄断公司管。中国由石油部統一管。石油部实际上是一个大公司，下面沒有石油厅，很好，如果有石油厅就不得了。煤炭部也是一个大公司。……按公司来搞，同按部来搞，观念就不一样，铁道部也是这样。輕工业部行业多一些，就不行。”

“领导干部既要有业务知識，又要懂得发动群众。一个大企业工作搞好，即可增加几千万元的财产，这是基础。几千个企业，都这样搞，国家就兴旺，前途就光明。”

“各行各业全国只有一个总公司，沒有几个总公司，是垄断的，可能有缺点，沒有人互相竞争，但也可以和外国比較，内部也可以互相比較，这样省的工作也可以划出一部分，由公司承担起来。搞公司法，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

“资本家的銀行、邮局是很有組織的，无产阶级可以拿过来为自己服务，一改变所有制，就成为社会主义的企业。”

“統統組織公司，有的部要組織几个公司。部主要搞点平衡监督。……过去部、厅、局，都是行政机关管工厂，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过去苏联也是这样搞的証明不行。……外国托拉斯还管銷售哩！将来石油部也可以搞点銷售，商业部可以分一两个商店給他們，叫他們去与市场 and 消費者接触”。

“总而言之，我們要解决这个問題。……現在一討論就是‘条条’‘块块’。如紙烟，中央一决机械可以包作，包修、包用。收购烟叶子，棉花也可以由紡織公司收购，主要按生产需要分級。定，还不是統一哪！这样，它就可以收购烟叶子，棉花也可以由紡織公司收购，主要按生产需要分級。商业部門就不懂得这个技术；他是商业观点，缺乏生产观点……。”

“……封建时代設專門的諫官、御史，就是專門讲‘閑話’的官。每个企业都搞那么几个人，专讲‘閑話’，专挑毛病，向上級打报告，他們讲的‘閑話’不可能完全正确，經過检查讲錯了，可以不算，不可能都讲对。这些‘諫官’也要联系群众，到車間找工人座談、开会，吸收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專門找人讲‘閑話’。”

“企业是生产斗争的最前綫，接近工人。干部不行，影响工人。公司可搞一些吃閑飯的人，如董事之类。”

薄一波在推行刘少奇的所謂用经济办法管理企业，搞托拉斯的过程中，也仿效南斯拉夫的腔調，攻击无产阶级的管理机构是官僚主义的机构，胡說部长变成托拉斯經理就可以避免减少官僚主义了。薄一波还勾結邓小平，仿照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准备把計划、物资、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等大权統归托拉斯掌握。

薄一波秉承刘少奇的指示，組織人馬收集馬恩列斯关于托拉斯論断，从理論上为刘少奇找根据。还广为收集资本主义国家和苏修組織托拉斯的經驗，編写資料和小册子，大肆传播。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刘少奇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員第四次扩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都犯过許多錯誤”。

十二月，中央批轉湖南省委的两个文件，作了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驕傲自滿的指示。提出“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工作成績工作作风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視若無睹，永远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請教一番。一个部所管企业事业，明明有許多厂矿、企业、事业、科学研究处所及其人員，工作做得較好，上面却不知道，因而也不能提倡人們向那些单位学习。……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祿、养尊处优、驕傲自滿、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們，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現在必須加以改革。……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經驗、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

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提出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毛主席說：“国家工业各个部門現在有人提議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設政治部、政治处、政治指导員，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門、农业部門（还有商业部門）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个問題我考虑了几年了，現在因为工业部門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績可以說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論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門采用和学习了。”

一九六三年底，全国工业交通會議对主席关于加强互相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驕傲自滿的指示和关于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只是組織大家念了一念，沒有深入討論和提出貫徹执行的有力措施，而另提“两赶三消灭”的口号。这实际上是用经济掛帅来对抗主席提出的政治掛帅。

(五)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設的新阶段

(1964年——1966年)

一九六四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进入了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出现了一个全面大跃进的局面，这些成就的取得，都应归功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在近几年来，毛主席在全国提出了一系列英明决策，正如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所說的：

“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这些决策主要的是：

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发揚群众路綫的革命传统問題，

……

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針，

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問題，

关于經濟建設和国防建設的体系和布局的問題，

关于全党抓軍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

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和布署的問題，

关于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成为一个革命化大学校的号召。”

一九六四年

从一九六四年开始，一个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已蔚然成风。正如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全党全国大学毛泽东同志著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嶄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潰，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針。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軍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輝的榜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識分子和广大革命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們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証。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带着問題学，活学活用，学用結合，急用先学，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广。

但是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之流却疯狂地攻击毛主席和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时說：“……現在学习毛选出現了一种形式主义，这样搞下去，会弄虛作假，学习毛主席著作，千万字的讀書筆記，千万不要宣传。”他又在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各中央局，省、地委会上报告中說：“現在無論在农村，在城乡了解情况用毛主席的那种开調查会的方法已不行了，兴华大队蹲点的事就可以說明。”在64年9月13日刘少奇給江苏第一书记江渭清的信中說：“同不能把馬克思列宁的学說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講話当成教条……。現在不是你一个人犯这样的錯誤，党内已有一部份干部犯同类性质的錯誤。”在同一封信中他还

說：“老实說你那篇講話，几乎没有什么創造，空論連篇，講話的前一部分，是大段摘引第一个十条和毛主席的話，沒有你自己的多少話。……由于你是大量地摘引和重述別人的講話和中央文件，即使都是很好的講話，……都找不出錯誤……但是你却犯了教条主义的錯誤。……学习第一个十条和毛主席的讲话高低……，我們的原則，只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管他們取

上行下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也亦步亦趋地追随其主子刘少奇，薄也喋喋不休地叫喊：“不要把学习毛著庸俗化了。”还攻击林彪同志带着問題学的指示說：“带着問題学，有了問題学毛著能解决嗎？”薄在六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組长汇报会上，攻击学习主席語录說：“把两句話摘出来看不出前后的背景，还是学几篇文章好。”在此次會議上薄一波利用所謂的工业企业“特性”来反对主席提出的大学解放军的号召。薄一波甚至公然說：“我就不相信群众学了《愚公移山》干劲那么大，就那样解决問題。有些經驗介紹說有了問題是学习毛著解决的，真是那么容易嗎？是总结經驗时总结出来的吧？”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毛主席說：大庆油田的經驗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具有普遍意义。他們贯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坚持政治掛帅，坚持群众路綫，系統地学习和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經驗，把政治思想、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紧密結合起来，把工作作活了，把事情作活了。它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它的一些主要經驗，不仅在工业部門中适用，在交通、財貿、文教各部門，在党、政、軍、群众团体的各級机关中都适用，或者可作参考。

然而薄一波秉承其主子刘少奇的黑指示，千方百计貶低和抵制毛主席关于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胡說：“大庆經驗代表不了我們整个工业情况”，“大庆是好的，少奇同志就怕我們学歪了。”

薄一波在一九六四年工交会上，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抓了一下学大庆，但却故意歪曲大庆的經驗，把“評功摆好”摆在重要地位加以推广，致使許多厂矿犯了錯誤，使全国学大庆的高潮出現形式主义傾向，歪曲了学习大庆的本质，在中央和毛主席指出这一錯誤傾向之后，薄便大泼冷水联合彭真追查“評功摆好的根子”，妄图与彭真合謀把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庆紅旗砍倒，把全国学大庆的高潮打下去。

扣压大庆油田一九六四年会战总结，不准宣传大庆經驗。一九六四年底大庆油田遵照毛主席一分为二的指示，給經委写了一个《以两分法为武器大踏步前进》的总结，薄一波在二月全国工交會議上以石油部有驕傲自滿情緒为借口胡說：“报告本身就不两分法”拒不批轉这个报告，同时蛮横地决定停止正在印刷的大庆政治工作經驗和企业管理經驗两本小册子的出版。

企图以“学上海”代替学大庆，一九六四年三月初，薄一波在全国机械工业調整规划會議上作报告，讲了学大庆以后，就提出学上海，并說：“其实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学习上海和学习一切先进部門先进地区先进单位先进人物实际上是一回事。”还叫嚷“学习大庆的优点，并不是要抹煞自己的优点成績”“不能說人家好，自己就‘六宮粉黛无顏色’了。”

一九六四年一月，薄一波在一次會議上讲到毛主席号召学习石油部时，公开污蔑說：“真是‘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七日，薄一波在研究大庆报导时說：“大庆不作总的报导，不作总的評論，份量不要太多，太多了就沒有人看了。”

“有些詞句，如大庆对全国石油基本自給作出巨大貢獻，好話說多了，就不愿再听了。有些地方不要夸夸其談。”

刘、邓、薄推行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綫，破坏“四清”运动，这一年刘少奇到处作报告，吹捧王光美在“桃园大队的四清經驗”，推行他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綫。

他說：“有些基层干部問題严重，政权不是共产党手里的，你們讲有百分之三十，恐怕大体合乎实际。”“工会系統恐怕不行了，要重新組織，从扎根串連发现好的，重新組織。用什么名义都可以，就是要革命。”

七月，邓小平、薄一波到东北視察，邓小平提出：“企业四清主要是解决領導班子不齐，不力，不好”的意見，从工交部門抽人組織大工作队的意見，薄都大加贊揚，立即传达，照此执行。薄一波把刘

少奇去上海、武汉、北京等地的报告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也推崇备至，并照搬到城市四清工作中。

刘少奇进一步推销他办企业的修正主义路线。

物资部向他汇报时，他主张物资部门按照资本主义的办法，搞买空卖空的投机商，他说：“它（指要搞的名曰“服务公司”）就是皮包公司，就只要一个电话一个皮包，代人服务。过去上海英国人就是这样搞的。有人要买一些零件，上海没有，就打电话给新加坡，货就来了。”他又叫向买办学习，要学资本家的管理办法，他说：“资本家开过洋行的，当过买办的，他们有经验也要向他们学习。”“把全国仓库按着他们（过去的买办企业）那一套管理起来。”刘少奇完全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主张物资部门根据需要用订货办法，决定生产。他说：“盲目生产的产品你们就不收购，不能鼓励盲目生产。到一定时候，物资部门也要向商业部门一样，搞加工订货；企业生产听你指挥，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就可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

刘少奇三月对××说：“现在我们所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发动群众搞四清，一个是改革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以后十一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补充了“干部参加劳动”这一条。他说“到目前为止，只有这三个办法。”

薄一波把一月工作会议毛主席的讲话和刘少奇对抗主席的讲话放在一起，编印成《两位主席的讲话》。薄一波对毛主席《管理也是社教》的批示，不讨论、不研究、不贯彻执行。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说主席要求我们好好学技术、学业务，要求大家赶快学好一两门技术。用突出技术来冲击政治。

在计划工作中推行修正主义。四月，薄一波按照邓小平、陈云的以“吃、穿、用”为纲的指示，主持编制了《三五计划》，贩卖了赫鲁晓夫的“和平主义”、“生活福利第一”的一整套修正主义货色。

薄一波遵照刘少奇的黑指示，办了十二个全国性的托拉斯。

一九六五年

一月，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批判了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形“左”实右的错误，并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条三）。这个文件特别对运动的性质作了明确回答：“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城乡社会主义阵地。”

《二十三条》还讲了思想方法，指出：“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加以分析。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是形而上学。罗列一大堆表面现象，拼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条文，使人得不到要领，是烦琐哲学。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邓小平、薄一波反对二十三条。

邓小平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中央书记处会上说：“机关工厂学校的四清工作队一进门，立刻就要同干部结合起来。”

一九六五年三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上攻击六四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运动过火了，妨碍学术繁荣，因此“立即刹车”。

七月，在北戴河召开企业四清座谈会，薄一波按照邓小平的旨意，制定了一个同《二十三条》唱反调的《全国工交系统四清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中，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右倾的，不提斗争的

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斗争对象强调自觉革命、区别对待，而不是强调放手发动群众以及从经营管理入手等等。

《二十三条》说：“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而《纪要》却说：“我不能加以夸大，因为无论那种片面性，都妨碍四清运动健康地发展，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二十三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的社会主义阵地”。《纪要》说：“首先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解决干部四不清问题，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查清坏人。同时也要克服干部的官僚主义，改良不利生产的经营管理。”

《二十三条》说：“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作到，依靠群众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纪要》说“工作队必须信相群众大多数和干部大多数，运动一开始就要实行同群众、干部三结合。并尽量发挥原有组织的作用，不能包办代替。”

《二十三条》说，“拿一个县来说，在四清中，四清后，要逐步把党的领导核心搞好，逐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工具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逐步建设好一个社会主义的县，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各方面都有所前进。”《纪要》说：“凡是生产上没有作出成绩的企业，就不能说四清运动取得成功。”

《人民日报》十一月发表了林彪同志提出的一九六六年全军工作的五项原则。林彪同志讲道：“什么是最好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最大的战斗力？最大的战斗力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勇敢，不怕死。突出了政治，就会出好人好事，不突出政治就会出坏人坏事。”

刘邓薄继续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一九六五年在中央书记处会上恶毒攻击学毛主席著作，“在青年中毛主席著作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是要提倡学的，但一年四季都这么搞也不行。”又说“四篇文章可以学（指“老三篇”加《反对自由主义》），但是年年都学几篇作用也不大……今天讨论了明天又要讨论，总要让人家学得有味道。”

“毛选……有些文章学过很多遍，听报告一次不到就叫不积极。一个报告听一次就够了嘛，为什么要让反复听，形式主义害死人。”当全国开展学毛著高潮时，邓小平说“学物理的整天背雷锋日记、毛主席语录，不能算又红又专。”“现在苛捐杂税太多了，乱抓乱管问题很多……有的机关每天下班后规定学毛选、学文件……效果很差，是搞疲劳战术，实际上是社会负担，不学毛选不能得奖。……不是带着问题学，是带着任务学，形式主义真害人。”

薄一波污蔑工农兵学毛著是庸俗化，在经委的一次会上说，“在电影里工人在技术问题上遇到困难，就回头翻毛选，这怎么能解决呢？”

一九六五年八月，对宣传部门谈关于工业宣传报导时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宣传有些庸俗化，不要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都说学了“愚公移山”后解决了，都没有把怎样通过认真学习解决问题的过程写出来，报导简单化，结果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庸俗化了。”

一九六五年四月，纺织机械托拉斯在上海向薄一波汇报时，薄说：“不是遇到一个问题把毛主席著作拿出来一看就解决了，一个螺丝钉不会做，找出毛著就解决了，这是不可能的，我就不相信。”

薄一波多方阻挠召开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会。工交政治部从一九六五年起几次提出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薄一波不仅不支持，反而吹冷风说：“学那两本书就能活学活用啦，我就不相信《愚公移山》有那么大的作用。”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毛主席对陈正人蹲点报告，作了“管理也是社教”的重要批示，薄一波不研究，不贯彻，反而极力贬低毛主席这一指示的伟大意义说，这只是要干部学业务的，甚至污蔑说，这只是对陈正人的批评。

一九六五年七月，薄一波在工交会议上说：“光思想好，读书（指主席著作）多少页，技术业务不

行，还是不行。”

一九六五年，薄一波说过：“我问过沈鸿，你搞水压机尽看什么书？沈鸿告诉我，他第一看计算数据，第二看……，他就沒有說看了多少毛主席著作。”

一九六六年

二月份，召开全国工交会议，讨论突出政治问题，薄一波坚持刘、邓路线，反对突出政治，攻击毛主席关于反对折衷主义的指示。他继续鼓吹他的“工业特殊论”说：“政治工作仅仅是为生产服务的工具，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而不是落实到职工思想革命化上；企业第一位的任务是产品。”反对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第一位，把人的思想革命化放在第一位。

三月初，薄一波、陶鲁笳在刘、邓等人的支持下，成立了工交党委，把工交各部及物资部的党委书记都拉入工交党委，妄图独霸工交，财经大权。

三月中旬，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和工业体制作了重要的指示，毛主席对刘、邓、薄片面强调集中、垄断、压制地方积极性的错误提出了批评，指出这种作法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四月，薄、陶急忙忙召集了工交各部，讨论工业管理体制问题，他们一面要各部赶快下放工厂，妄图减轻罪责，一面别有用心地印发了几年前由薄一波自行整理的毛主席讲话。他利用这篇讲话，打着“红旗”反红旗，鼓吹各都管工业要“一通到底”，攻击地方“抢钱，抢物资”，喧嚷要地方管“虚”的，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各都要“虚君共和”的指示。

五月，毛主席发出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七”指示。薄一直不采取任何措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连各都贯彻“五七”指示报告，他也不看。